论汉赋空间书写的政治意涵与情感机制

王　晴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1）

摘　要：汉赋在不同的空间构型中，展开了情感流动与权力话语交织的诗性实践。征行空间以物理位移构建情感轨迹，通过地理空间铺陈、历史空间复现及情感空间投射三重叙事维度，展现汉代士人在政治动荡中思想转化与情感升华的过程；宴饮空间则以政治与家园双重场域建构帝国权力想象与地方文化认同，形成帝都中心与地域文化复调并置的空间结构；而宫殿空间中，惊恐情感的定势反应，指向了汉儒对仁义礼仪的呼唤遭遇政统难改的现实困境，惊恐情感遂异化为文化焦虑的症候。这三种空间形态，既展现出制度与权力的运作逻辑，也作为情绪生发与身份认同的载体，反映出汉代士人复杂的政治感知与精神世界。正是这种多维度空间书写的诗学实践，使汉赋一面塑造了帝国理想的美学图景，一面反映着士人复杂的心灵世界，最终在文学史层面上实现了对儒家诗教传统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汉赋；空间；情感机制；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064-7

收稿日期：2025-07-16

作者简介：王　晴（1991-），女，黑龙江绥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05

空间并非简单的物理呈现，而是主体心理建构与主观情感反应的结果。空间的心理和情感维度是理解空间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空间的建构与人的心理、情感，即“空间意识、空间知觉、空间记忆、空间体验、空间想象”①密不可分。在汉代文学中，“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②。赋作为“体物”之文，“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③，以铺陈与图绘之长，成为书写帝国空间与建构情感图式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化文类，汉赋不仅描摹了从宫殿到山川、从朝廷宴飨到边地行旅的多样空间景观，更在空间的建构中隐含了政治话语的运作与情感机制的流转。所以，空间不只是赋的描写对象，更是感知心灵归属和政治秩序的场域，是诗性转喻生成的触点。汉代的宇宙观念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构成了空间与情感联动的文化语境，而赋家的“得之于内”，则让赋成为一种融合政治意涵与情感体验的文学空间书写方式。

一、征行空间的位移与情感的嬗变

“纪行赋”是汉赋的重要一类，自萧统《文选》立类以来，《艺文类聚》《历代赋汇》皆承设“行旅”之目。此类赋以真实行旅经历为叙述框架，借对沿途历史遗迹与名人故实的阐述，怀古述志，具体呈现出地理空间的铺陈、历史空间的复现、主体的情感空间投射三重维度，交织构建了“征行空间”的诗学结构。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堪称汉代纪行赋的代表作，赋中通过对旅途中的空间场景的动态变换，展现出情感能量在空间位移中的层积，情感势能不断增殖或嬗变。

关于情感嬗变方式，一是线性强化的情感增殖。梅新林曾指出，空间情感具有间阻性特征，“时间相隔越久，空间距离越远，情绪强度可能越大”④，情感强度与时空阻隔程度呈正相关。纪行赋中，作家将地理

①方英：《理解空间：文学空间叙事研究的前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成公绥著：《天地赋》，载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89页。

③[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④梅新林、葛永海著：《文学地理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7页。

疏离转化为情感催化因子，形成愈远愈炽的情感增殖模式。《北征赋》中，郇邠—义渠—泥阳—彭阳—安定长城—朝那，六度空间的转换构成情感演进的递进脉络。在郇邠，作者表达的是“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①的个体忧愤。经泥阳，“祖庙之不修”②引发了作者的家族悲情。至高平，“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的惨痛民生现状令其“揽余涕以于邑兮”③。荒原的地理空间与代表生民苦难的“表征性空间”④相融，个人、家族的生存焦虑在此升华为“哀生民之多故”⑤的集体焦虑。情感突破私人领域，向社会关怀跃升。蔡邕《述行赋》一共书写了大梁、中牟、管邑、荥阳、虎牢、坛坎、巩县、偃师、京邑等多个空间。从大梁至荥阳，“诮无忌”“哀晋鄙”“忽朱亥”“憎佛肹”“愠叔氏”⑥，简笔勾勒历史上的君臣恩怨，情感相对克制。但从虎牢至偃师，始增叙述和抒情的成分。在虎牢，细述轩涛涂与郑申侯之事件，加入“登长阪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峣陉”⑦等景物描写，强化空间张力。在偃师，“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⑧，作者凭吊良久的田横墓作为忠义符号，激发了作者的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至京邑，通过对比贵宠之人、当权者与百姓的生活状况，形成了京邑奢靡空间与民间疾苦空间的并置，面对“正路之日涩”⑨，赋中情感最终变为对国家前途无望的哀愤。该赋空间情感经历了“平和—忧思—哀愤”的变化，随着趋近京师，作者目光也从前朝旧事回到现实政局，且情感随地理空间的位移而层层递进、蓄积然后爆发。二赋中，作者通过空间位移，情感脉络逐渐从个体忧愤转向对家国兴亡与时代命运的关注。梅新林指出：“地理空间进入文学之后，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形式，而与人的情感、心理、精神相关联，与人的生命深度直接对应，从而具备了精神性特征。”⑩班、蔡二人的征行轨迹皆构成独特的情感地图：班氏自中原腹地至西北边陲，随着空间及景观的不断变换，情感越发悲怆；蔡氏由地方郡县至京畿核心，随着空间趋近权力中心，批判愈发尖锐。这种空间与情感的线性对应，体现了时空书写中地缘与情缘同构的叙事架构。

二是理性转化的空间重构。与线性强化模式形成对照，刘歆《遂初赋》与班昭《东征赋》展现了情感在空间序列中的理性化转向。《东征赋》中，班昭共经历了“偃师—封丘—匡城—长垣—蒲城”五个空间。在偃师，班昭怀有“去故就新”的个体悲情，延续至封丘，“慕京师而窃叹”。前两个空间内她的怀“家”情结浓烈，从匡郭起，她的情感重心开始转变，将目光投向历史人物，“念夫子之厄勤”⑪，对孔子遭困感到惆怅和惋惜。至长垣，仅记“察农野之居民”⑫，家园情结与怀古之思在空间延展中趋于内敛。到达蒲城时，面对“生荆棘之榛榛”⑬的荒芜景象，刻意悬置悲愁，转而引入卫人嘉子路和民尚蘧瑗丘坟的事例，藉此完成了道德空间的构建。最终以“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⑭作为价值讨论的落点，标志其情感随行旅空间的终结沉淀为理性认知。班昭在空间位移的过程中，关注视角由“家”扩展至“国”，情感亦经历了“怀悲—思贤—重德”的递进式转变，实现了由“情”至“理”的深层转化。

再观《遂初赋》，其情感于最末空间开始转变。全赋依次塑造了黎侯、长平、屯留、余吾、下虒、铜鞮、侯田、太原、晋阳、临沃共十个文学空间。在“黎侯—余吾”段，作者先在黎侯之地“慕远”，而后于长平“吊赵括”“庆辛甲”，在屯留、余吾追忆“执孙蒯”“救王师”之事，作者以密集的典故与英雄叙事构建起快速流转的历史空间感。自“下虒—铜鞮—太原”段，叙事节奏趋缓，空间描写更加细腻，以仲尼“穷乎蔡陈”、“柳下黜而三辱”、贤人“蘧瑗抑而再奔”⑮等儒家困境叙事，构建起儒士的精神困境空间，作者是在借圣贤屈辱影射自身遭小人谗妒、志意不得伸张的政治困境。至临沃，叙事维度发生转换。“亭隧之皦皦”“旗帜之翩翩”的边塞意象替代了史实铺陈，赋中呼吁保卫城池，发扬“武灵之精诚”和“赵奢之策虑”⑯，实则将军事智慧转化为应对现实困境的方法，这不仅使地理场域向军事空间转换，更标志着主体精神从情感宣泄转向了理性

---

①②③⑤⑪⑫⑬⑭⑮⑯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上册，第360页，第360页，第361页，第361页，第553页，第553页，第553页，第553页，第317页，第318页。

④“表征性空间”一词见[法]亨利·列斐伏尔著：《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孟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63页。原文：“表征性空间，并不需要服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规则，它们充满想象的与象征的元素。”

⑥⑦⑧⑨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下册，第912页，第912页，第913页，第913页。

⑩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第386页。

重构。而后对“性命之变态”的思索与对“万物之珍怪”的观照，以及自身“长恬淡以欢娱”[①]的超世理想，使文学空间演化为承载道家理想的虚静之境。梅新林提出空间情感具有补偿性，即“以一种空间情感替代另一种空间情感”[②]，此处，刘歆即是在政治困境空间失落后，模拟一个道家玄理空间作为代替。这也折射出西汉末年士人解构现实困境的方法，以及安顿个体生命、实现思想突围的意识。刘歆的情感轨迹经历了“憎恶—批判—反思—超脱”的变化，在空间位移中不断重构自我，最终在书琴玄理构筑的补偿性空间中，由政治主体变为哲学主体，情感进入具有哲思性的超脱维度。纵观两赋，《东征赋》由“情”转“理”，情感轨迹最终在道德空间的建构中完成个体悲情的超越，《遂初赋》由“情”转“玄”，情感脉络最终在玄理空间的建构中完成政治困境的解构。它们将地理位移转化为精神蜕变的途径，展现了汉代士人应对精神危机时的多元面向。

综上，汉赋纪行类作品以空间位移为叙事框架，通过地理铺陈、历史复现及情感投射三重叙事维度，实现了情感由积累至升华、转化的复杂变化。无论是班、蔡二赋中随地理场域推移而线性增殖的情感跃升，抑或是班、刘二赋借空间秩序实现理性转化与哲思升华，均体现了文学空间不仅是承载作家命运轨迹、寄寓情感的场所，更是士人实现思想蜕变、重构生命意义的象征性场域。“述行言志”的征行空间，展示了汉代士人面对动荡政局时，以笔为舟，求得自我确证和思想安顿的诗性姿态。

二、宴饮空间的性质差异与情感张力

基于人本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这一重要概念，梅新林系统阐释了空间情结与空间情感的关系，认为空间情感来源于个人的空间认知、空间经历和内心感悟。[③]空间情结以空间情感为核心内容，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情感，而是一种基于“恋地情结”的特别强烈、持久、深刻的情感。[④]这种理论投射于文学实践，梅新林曾基于《红楼梦》提出“金陵情结”，称这种精神现象实则“发源于作者潜意识的生命冲动”[⑤]。葛永海亦探讨过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城市情结，提出作家对于城市的情结“折射出作家的深层创作心理”[⑥]。而向前追溯，在汉赋的都市书写中，空间情感呈现出政治理性与家园诗情的两极张力。

根据空间性质的不同，京都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为代表的政论型赋作，这类赋聚焦东汉定都之争，将长安、洛阳视为偏重政治属性的帝都空间。一类是以《南都赋》《鲁都赋》《齐都赋》《蜀都赋》为代表的家园型赋作，通过“恋地情结”驱动地域书写，政治规训弱化，建构起偏重家园属性、具有情感温度的城邑空间。都城空间属性的分野，催生了作者情感投射机制的不同取向，当聚焦礼制规训的政治场域时，理性化的集体意识统摄文本肌理；而当书写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原乡时，个体化的生命经验构筑诗性家园。

在具有政治属性的帝都空间与家园属性的城邑空间中，宴饮场景的差异性书写形成了政治理性与家园诗情的空间隐喻。就食物意象而言，政治性宴饮通过食材等级建构权力秩序。《东都赋》中“嘉珍御，大牢飨”[⑦]的描写，珍稀食材实为权力阶序的物化象征，以本属祭天地、飨先祖的“大牢”之礼，移用于宴饮场景，实则通过礼制符号的降维使用，使宴饮场景被赋予祭祀空间的神圣性，在味觉维度建构起“礼制神圣性”的情感认同，众宾在咀嚼珍馐时无意识地完成了对皇权秩序的臣服。这种将宴饮之礼与祭祀制度同构的书写策略，是汉代以礼经世政治思想的空间化呈现。而具有家园属性的饮食书写，如《齐都赋》：“兰豕臑羔，鳆鳖脍鲤，嘉旨杂遝，丰实左右，前彻后著，恶可胜数。”[⑧]通过食材之“杂遝”，以及空间维度的横向延展和时间维度的纵向行进，共同构建了一个流动的味觉地理图谱，使家园情结在味觉感官中得到本能释放。

---

①⑦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册，第318页，第497页。

②③④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第459页，第452页，第455页。

⑤梅新林：《〈红楼梦〉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四辑。

⑥葛永海：《〈红楼梦〉、〈儒林外史〉中“金陵情结”之比较》，《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二辑。

⑧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下册，第990页。

器皿意象的描写更彰显空间情感的结构性分野。政治宴饮中，“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①(《东都赋》)，通过展现“庭实千品”的丰饶陈列，构筑起万国来朝的帝国想象。具备礼器属性的“金罍”“玉觞”的物质符号，暗含“器以藏礼”的意识形态建构，展现了宴饮场面之奢华和大汉王朝之威仪，也体现了班固食礼互文的书写范式。相较之下，《南都赋》在书写每个季节举行的祭祀大典，聚宗族、邀远朋时，所陈“珍羞琅玕，充溢圆方。琢雕狎猎，金银琳琅”②的器皿书写，呈现了地方文人的文化本位。当“金罍”“玉觞”让位于“圆方”杂陈的日常器皿，宴饮场景便从礼制与权力的展演现场回归到生命本真的欢场。雕琢花纹之食器，以工艺繁复、色彩明丽之美，消解了礼器的严肃与神圣，重构出充满生活质感的日常美学空间。1954 年 3 月，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画像石墓中有两幅祭祀图③，展示了宗族祭祀宴饮的具体情况：首图祠庙前设祭几、牺牲，亲朋执笏跪拜，侍者备车马祭品；次图一吏于屋前读祭文，十九宾客列队行礼，左端地上有案、盘、壶、食、篡等，案上放置果品、鱼、耳杯。《南都赋》中述及的民间祭祀宴饮场面与汉画像有些许吻合，均反映了民间享祖祭祀仪式的精简，以及敦亲睦族的意图。

宴饮场景中，除了食物与器皿意象，通过对舞乐场面的解码，亦可见两种性质的宴饮场景在礼乐叙事维度上的鲜明对话。《东都赋》的舞乐描写：

> 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絃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浹，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④

“陈金石”意味着对周代金声玉振雅乐传统的承袭，而“铿鎗”的钟鼓并作之声，是以音律的物理强度隐喻政治声威。“八佾”之舞与“《韶》、《武》”之乐，遵循天子八佾的礼制规范，奏上古之雅乐，在钟磬雅乐与佾舞方阵的空间布排下，舞乐场面升格成礼乐制度的展演场域。“伶侏兜离”四方少数民族乐舞组成了“万乐备”的乐种拼图。班固至此构建起了“百礼暨”的空间政治学，钟磬雅乐的纵向维度象征礼制传承，四方乐舞的横向铺展则暗喻疆域统合。政治性宴乐呈现的“乐—礼—政”三位一体的交互结构，本质上是礼乐制度与皇权秩序的空间展演。

相较之下，《南都赋》中乐工“弹琴撷籥”的素朴乐事，主宾互诵《诗经》名篇的仪式，建构起“可以群”的文人诗乐空间，诗酒唱和替代礼制规训，宴饮场域蜕变为文化基因的传承空间。《齐都赋》中“磬管锵锵，钟鼓喈喈。制度之妙，非众所奇”⑤，描写宗族间隆盛的聚会，展现自然韵律的同时，通过“制度之妙”的审美判断，使钟鼓磬管摆脱礼器功能，而成为传递音声美学的载体。而这种去政治化的乐舞书写，在《蜀都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

> 侯、罗、司马，郭、范、晶、杨，置酒乎荥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众器雕琢，早刻将皇，朱缘之画，邠盼丽光。龙蛇蜿蜒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昔天地降生杜虒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声呼吟靖领，激呦喝啾，……。及庙嚐吟，诸连单情，舞曲转节，踹跋应声。……踊《凄秋》，发《阳春》。⑥

吉日举行的隆盛聚会，“侯、罗、司马、郭、范、晶、杨”等大户人家设酒宴，实为巴蜀大族世系的空间化展演。关于蜀王杜宇、荆人鳖灵的蜀地特色壁画，则成为可视化的地方志，将宴饮空间铭刻为强化地方认同的拓扑图，使饮食仪式升格为地方文化记忆的存储媒介。席间歌女“呼吟靖领，激呦喝啾”的悲音，以及与“《凄秋》”“《阳春》”组成悲欣复调，突破礼乐中和的同时，将宴饮空间转化为情感共振的多维场域，使空间叙事突破权力话语茧房，转而成为追求生命经验的诗性显影。

政治性宴饮空间通过饮食和舞乐表现礼制传承、疆域统合、乐政同构的帝国想象，将宴饮空间升格为权力秩序的展演场域。家园性宴饮则通过地方特色美食、壁画，文人诗乐互动，个体悲情表达等，表现了作者

---

①④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下册，第 497 页，第 497 页。

②⑤⑥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册，第 727 页，第 991 页，第 214-215 页。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年，第 136-137 页。

的地方文化本位意识，将空间建构成去中心化的文化场域。比如，蜀地宴厅的器物纹饰、声腔韵律、特色壁画等形成象征系统，实则是巴蜀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软性解构。这种空间书写策略，本质是通过微物叙事建构文化主体性。班固笔下“万国来朝”的帝国想象，在四赋中被解构成多元文明共生的拼图。两种性质的宴饮场面，体现了“恋地情结”的双重内涵：当都城作为政治容器时，主体表达让位于礼制展演，情结表现为制度崇拜的集体执念；当都城作为文化原乡时，血脉记忆得到诗意彰显，宴饮空间成为汉代文人的个体精神图谱的显示媒介。这种差异化书写，构建了一个士人群体在帝国秩序与地方认同之间的情感坐标，也折射出汉代文人的双重文化立场，当笔墨游走于帝都庙堂时，宴饮场景成为权力与秩序的符号载体；而当视角回归地方家园时，饮食叙事则化作文化基因的传承密码。二者共同构成汉代都市书写的复调结构——既是帝国威仪与地方认同的空间博弈，亦是集体秩序与个体生命的永恒对话。

三、宫殿空间的权力话语与情感生产

在宫殿空间建构中呈现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赋家对宫殿空间的观览体验往往被惊恐类情感所主导。班固《西都赋》：“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椳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恍恍以失度，巡回途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①]赋家用“目眴”“意迷”的生理眩晕和“魂恍恍以失度”的精神震颤，建构起一个高度压迫感与心理威慑并存的情感空间。类似描写在大赋中屡见不鲜，如王褒《甘泉赋》：“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②]张衡《西京赋》：“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怂兢。”[③]“惧”“惶惧”“怵”“悼栗”“怂兢”等情感符号，实则体现了“身体—空间”的互动，赋家面对宫殿时产生了深度感知和强烈的心理反应。

这类惊恐情感除了是自然感官的直观反映外，更是植根于宫殿空间所承载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之中。作为权力之所，宫殿不仅因其体量宏大、结构奇峻而令人震慑，更因其所象征的帝国秩序与神圣权威而引发敬畏。在出土的汉画像中，作为建筑构件出现的“层栌”“曲枅”等图像，表现出对于宫殿结构的视觉强调。在这一空间物象的书写上，汉赋文本与汉画像有着共通性。比如，繁钦《建章凤阙赋》曰：“长楹森以骈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层楼，肖华盖之丽天。……栌六翮以抚跱，俟高风之清凉。”[④]以凤阙之高比拟昆仑山，以托梁的栌木比拟大鸟之健羽，暗喻其通天之功用。赋家将宫殿构件写成山，在汉画像中是有据可循的。有学者集中展示了汉代“层栌”“曲枅”“斗拱”等画像，以及汉画像石上的昆仑山形象，发现二者神似，原因是：“他们同样是作为‘柱’这一存在呈现：‘层栌’‘曲枅’是宫殿的梁柱，帝王居住其内部，而昆仑山是天柱，天帝神仙居住其上。”[⑤]这种类比体现了汉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表现了赋家通过空间想象来证明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审视，宫殿建筑实为权力话语的物质化表达。殷周时期，都邑即为“政治与文化之标征”，至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择国之中而立宫”[⑥]的空间政治观念。“殿”在《康熙字典》中释为“堂高大者”[⑦]。“殿”也指帝王宸居，如《战国策·魏策四》：“仓鹰击于殿上。”[⑧]要离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时仓鹰击殿，这里的“殿”指帝王居所。当“殿”由“堂高大者”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帝王宸居”的政治空间时，便完成了皇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空间转喻。

这种惊恐情感的生成机制，需从物质空间和象征空间的双重维度来考察。西汉宫殿空间特征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地理位置的崇高与险峻并存。张衡《西京赋》描绘甘泉宫：

> 获林光于秦余。处甘泉之爽垲，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于迎风，增露寒与储胥。托乔基于山冈，直堮霓以高居。通天訾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上斑华以交纷，下刻峭其若削。翔鹍仰而不逮，况青

①②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册，第467页，第202页。

③④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下册，第631页，第1011页。

⑤王思豪：《文图一个时代——汉赋与汉画像互文主题及其文化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⑥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0页。

⑦[清]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645页。

⑧[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22页。

鸟与黄雀。伏棂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①

“隆崇而弘敷”“直堮霓以高居”展现了一种向上的空间结构，高耸嶙峋的宫殿结构形成视觉冲击的同时，更在心理上营造出仰视与遥不可及的感受；“下刻峭其若削”极显地势陡峭如刀削，不利于人攀登，有意利用地势形成威慑感；“翔鹍仰而不逮”的夸张书写，更在垂直维度上呈现出宫殿神圣不可侵犯的压制性。仰之带来的视觉震撼，与近之引发的身体警觉交互作用于赋家的感知系统，使观者在观览时由生理失衡引发心理震颤，最终完成了权力空间对个体情感的规训。

未央宫的选址更显深意。其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坐落于龙首山上，“睎秦领，睨北阜，挟酆鄗，据龙首”②。在此建未央宫体现了皇帝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③。它的地理选址蕴含着精妙的空间政治策略，酆、鄗二水构成天然的护城体系，龙首山制高点具备视觉统摄功能，二者共同建构起以自然屏障为依托的地缘政治架构。这种选址策略暗合“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又通过地理屏障的构建强化统治权威的正当性。

二是建筑形制的雄壮与失衡共生。关于建章宫“阙”的描写，班固《西都赋》：“设璧门之凤阙，上柧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④张衡《西京赋》：“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嶕峣。”⑤两处分别写到了凤阙、圜阙和别风阙，通过“竦擢”“竦以造天”“嶕峣”等词句突出阙之高耸与雄伟。《三辅旧事》载建章宫“殿东起别风阙高二十五丈”⑥。《三辅黄图》记建章宫正门“门内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⑦。这样的记载证实了建章宫之阙确实极高。“竦以造天”的阙之高度远超实用需求，意味着阙的功能已从实用维度走向仪式化夸张，这种宫阙建制实为权力美学的空间实践产物，失衡的雄壮实为规训工具，在垂直向度上形成压制感，观者因空间压迫产生目眩，因建筑结构的比例失调而“意迷”，最终在潜意识中完成对统治权威的被迫认同。

三是营造技术的精妙与威慑同在。关于宫殿营建的书写可视为技术美学的文学转译。《西都赋》与《西京赋》中有集中描写：

> 于是左城右平，重轩三阶。……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增槩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西都赋》）⑧
>
> 三阶重轩，镂槛文槐。右平左城，青琐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厓隒。坻崿鳞眴，栈鼿巉峭。襄岸夷涂，修路峻险。”（《西京赋》）⑨

“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刊层平堂，设切厓隒”，山坡被削为层层平地，宫殿沿山崖修建，开门就是险峻的山路，展现高妙的营造技术的同时，也将物理险峻升华为精神震慑。重轩三阶的建筑构造，表层是汉代夯筑技术的完美呈现，实则三重台基构成垂直向度的权力梯度，当建筑技术突破蔽风雨的基本功能，转向“重威”的政治诉求时，建筑便成为统治者宣扬合法性的空间容器。“增槩业峨”暗示层状分布的建筑群，在垂直向度形成压迫，“殊形诡制”通过非常态空间对人体认知秩序进行规训与重构。“镂槛文槐”“青琐丹墀”表现了建筑细节的艺术化与奢华，此种超乎实用功能的精工细作，展现了统治者对秩序与美学的极致掌控欲。当赋家用“目眴转而意迷”的生理反应描述空间体验时，实为权力空间对身体感知系统的成功重塑，宫殿空间的巍峨与险峻，最终转化为对统治秩序的敬畏与臣服。

赋家的惊恐情感蕴含着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张力。秦朝的灭亡给以班固、张衡为代表的汉儒的心灵带来十分强烈的震撼，赋家对仁义礼仪的期盼，使得《两都赋》和《二京赋》中多次流露对于宫殿逾越礼制的讽劝，体现了赋家对传统礼乐的坚守与复归诉求。然而，现实中的宫殿空间不仅未受遏制，规模反而更加宏阔。这种对比，使赋家的情感呈现出一种敬畏中夹杂无力感，赞许中暗藏惶惑的复杂心理。观览中流露

---

①⑤⑨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下册，第631页，第631页，第630页。

②④⑧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册，第465页，第467页，第466页。

③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⑥[东汉]赵岐等撰，[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决录 三辅故事 三辅旧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⑦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出的“惊恐”，折射的是赋家在坚持儒家传统礼乐理念时，以赋家为代表的道统在与政统二元对峙中的以道抗衡。然而不管道统有多么神圣的合法性，也不管他们持此神圣合法性之资源，对世俗权力进行多么强烈的批判，以王权为核心的政统却极少有较大的改观。① 所以，宫殿空间与惊恐情感的定势反应，最终指向了汉儒的精神困境：当仁义礼仪的呼唤遭遇政统难改的现实，惊恐情感遂异化为文化焦虑的症候。

在宏大的空间构型中，汉赋完成了一次诗性与政治的双重调度：一方面，通过对征行、宴饮、宫殿等不同空间的描绘，汉赋书写生成了具象可感的权力场域；另一方面，这些空间又承担着情感的触发与扩展功能，赋家在情感传递的同时，其也在权力结构中获得了位置确认和身份认同。在赋家“得之于内”的思维范式下，空间书写突破了单纯的场景描绘功能，成为折射汉代士人政治感知与精神经验的文化符号。当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交叠共振，赋家的精神图景在空间建构中展开，汉代士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与政治焦虑便获得了独特的审美呈现。正是这种多维度空间书写的诗学实践，使汉赋一面塑造了帝国理想的美学图景，一面反映着士人复杂的心灵世界，最终在文学史层面上实现了对儒家诗教传统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双重超越。

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Emotional Mechanism of Spatial Writing in Han Fu

WANG 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1, China)

Abstract: In diverse spatial configurations, Han Fu unfolds a poetic praxis interweaving emotional flux with power discourse. The itinerant space constructs emotional trajectories through physical displacement, manifesting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motional sublimation of Han literati amidst political turbulence via three narrative dimensions: geographical expanse, historical reenactment, and affective projection. The banquet space, as a dual arena of political ritual and domesticity, forges imperial power fantasies alongside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engendering a polyphonic spatial structure that juxtaposes the imperial center with 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thin palatial spaces, the codified expressions of trepidation reveal Han Confucians' existential dilemma—their advocacy for benevolent rites collides with the immutability of autocratic governance, transmuting such trepidation into symptoms of cultural anxiety. These tripartite spatial modalities not only expose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institutions and power but also serve as vessels for emotional genesi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irroring the intricate political sensibilities and spiritual cosmos of Han intellectuals. It is this multidimensional poetic engagement with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hat enables Han Fu to simultaneously sculpt an aesthetic utopia of imperial ideals and refract scholars'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ultimately transcending both the Confucian poetic tradition and imperial ideology with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an Fu; space; emotional mechanism; power discourse

[责任编辑　唐音]

① 胡学常著：《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页。